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及其限度

王大来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在接受理论看来,文本意义的实现有多种可能性,因而不同读者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由于译者同时又是原文的接受者,他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方面的创造性发挥是至关重要的。接受理论关于文本“意义”的概念,可以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以较为详尽地分析译者创造性的某些制约因素。通过讨论,可以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并非译者对原文有意识的背叛,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人变奏”。

关键词:接受理论; 文本意义; 创造性; 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5-0082-05

Wolfram Wilss 在《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译者对原文的“个人变奏”这一概念,阐释了译者的直觉和个人偏好在翻译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1]。此外,一些法国翻译理论家也对译者的自由和“背叛”进行了系统的学术讨论。Gideon Toury 对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规范进行了定义,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2]。可见,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发挥引起了译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在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规定性传统译论的影响下而不受重视。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文学领域中理论重心的转移,才出现了对这一翻译问题的有规模的研究。在多种被用于译学研究的文学理论中,接受理论因其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挑战而适应了当前的翻译研究现状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对译学研究的重新审视。接受理论重新定义了意义,重述了作者、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文本意义的多种阐释的合理性及范围问题上做出了努力。本文旨在运用描述性的方法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对译者创造性的必要性这一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同时也对译者创造性的制约因素进行较为详尽的讨论。

一、译者的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主要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有关。如果文本意义只是涉及到读者对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及意图等因素获得准确而完美的理解,如果阅读活动所涉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只是以作者及文本为中心,那么对译者创造性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毫无意义,因为这样一来,文本作者就成了文本理解和阐释的权威,译者的任务只是获得文本预先设定的“完美”答案从而用目标语言实现原文的意义。在接受理论看来,意义不是一个等待发掘的“东西”,而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对话”。Stanely Fish 把意义重新定义为文本的文字之间以及读者头脑中发生的事件,强调了意义的动态性和读者的能动参与^[3]。Iser 指出,意义不再是被定义的东西,

收稿日期: 2008-03-01

作者简介: 王大来(1963-),男,重庆璧山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实践,英汉语言与文化对比

而应该具有被体验的功能，读者永远不能穷尽文本潜在的全部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把意义看作是发生的某种东西（something that happens）^{[4]22}。由此可以看出，意义并非只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文本意义的实现有多种可能性，不同读者可能对文本获得不同理解和阐释。从这个角度出发，“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将有可能获得文本意义的个人理解和阐释。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将有可能发挥能动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学翻译活动。

我们认为，文学翻译即翻译意义。如果文本本身只存在一种意义，那么判断译文的标准就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文本意义可能存在多种有效的理解和阐释，那么判断译文的标准就应该至少有两个甚至多个。因此，判断译文的标准与文本意义的理解密切相关。根据接受理论对意义的阐释，我们可以把意义比作在强烈灯光下环顾的一颗钻石，钻石的不同刻面构成了不同的视角，从不同视角观看钻石就可得到钻石的不同形状，而钻石总的形状就是从不同视角映射出的不同形象的总和。因此，判断译文的标准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方面来看就不是唯一的，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文本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离不开读者的能动参与，作者不再是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译者在阅读过程中，同其他读者一样，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形成自己的理解。因此，文学翻译可以看成是在历史和动态的语境下译者的能动创造性与原文文本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各种相关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对该张力做出贡献。

影响译者理解的因素有很多且非常复杂，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来加以探讨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影响译者理解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从阅读行为发生的那一时刻起就受到历史的制约。一方面，读者总是历史的读者，总是生活在某一历史时期，其阅读活动离不开前人的阅读经验和前人对文本的理解。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变更，读者也在发生变化，文本的语言就赋予不同时代的读者新的意义，前一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可能不适应新的历史背景，新一代读者总能从阅读活动中获得文本意义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因此，如果把阅读活动的历史性放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过程中加以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译者完全有可能对文本做出创造性理解和阐释，因而文本的重新翻译是完全必要的。

译者不但生活在某一历史时期，而且还生活在某一社会文化背景中，这就意味着译者不得不在某一社会文化规范的范围内规约他的阅读行为。译者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可能是这样的：他会有意识地遵守代表他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主要社会文化习俗、价值、动机等的某些社会文化规范，同时他又会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偏好背离这些社会文化规范。一个社会通常有几个同等重要的社会文化规范，译者可能遵守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而置其它社会文化规范于不顾。在社会文化规范这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中，译者必须对他要遵守的社会文化规范进行定位从而确定理解策略。实际情况是，译者可能在某种文学翻译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也有可能因坚持某些文学规范或拥有某些诗学思想而产生自己的期待视野。在理解和阐释文学文本时，译者可能把自己的期待视野以一种规约的方式融入文本的期待视野之中，也有可能由于发现了文本的不规约特点，采用一套他认为更加适合的理解策略来修正自己的期待视野。在某种情况下，译者由于受到某种政治或思想的权威的鼓励或压制，采用某种特殊的理解策略来理解和阐释文本，以便迎合某些读者的口味。因此，在理解和阐释文本时，译者会根据自己的期待视野选择某种社会文化规范从而确定某种理解策略而发挥其能动创造性。

影响译者选择何种理解策略的因素也可以从微观方面来加以讨论。涉及到微观方面的因素很多,包括译者的经历、气质、动机、文学地位以及文学造诣等诸多方面。文学文本的语言因具有多种意义而可能具有多种理解和阐释,这就导致了在文本语言的框架内语言有多种不同的接受方式。如果作者在其文学作品中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或特有的语言风格,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比如,甚至讲英语国家的人也未能对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的理解达成共识。因此,同一文学文本的不同译者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也会因为自己的个人情况以及对文学现象和文学翻译的观点不同,并在自己的文学造诣提供指导的可能性范围内对文学文本的接受方式做出具体的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译者必须根据他长期形成的文学意识以及文学翻译规范等其它因素发挥其能动创造性。

在阅读过程中,也有一些因素影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根据 Iser 的美学反应论,阅读过程也就是读者对文本的“空白具体化”的过程(concretization of blanks)。在这一过程中,任何读者都要面对语言的有限性和理解的开放性以及理解的开放性和意义的生产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作者在文本中所要表达的意义或文本语言直接揭示的意义是有限的。然而,语言的有限性特征使得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能够开放性地理解文本意义。文本的不完整性产生了文本的不确定性或者“空白”,这就表明了读者对文本意义能动参与的可能性。在 Iser 看来,在文本的整个图式结构中存在着许多空白,读者正是在填补这一个个空白的过程中实现文本的理解^{[4][123]}。文学文本通常比其它文本有更多的空白,因而增加了文本不同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高明的作者往往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为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通过空白的具体化,读者完成审美历程并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因此,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其能动性的参与和创造性的理解就不言而喻地可能实现。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同时也是译作的生产者。在译文的生产过程中,译者运用他认为最为适合的翻译策略来重构原文的图式。虽然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翻译规范的制约,但是他仍能根据个人的翻译目的、翻译习惯、文学造诣以及语言能力等因素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从而发挥其创造性潜能。如前所述,作者常常会在作品中有意识地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即 Iser 所说的“空白”,作为文本的读者,译者和原文作者共同参与一个想象的游戏,因此译者必须创造性地填补原文的空白。在生产译文时,译者又须将他填补空白的创造性理解和阐释转换成留有空白的译文,以便译文读者同原文读者一样在填补译文空白的过程中参加想象的游戏从而完成审美历程。如果译者在译文中什么都给了读者,那么读者就没事可做了,阅读译文也将会因此变得枯燥乏味。从这一角度分析,由于译者在生产译文的过程中将他在理解文本时创造性地填补的空白转换成设有空白的译文,译者必然要根据自己的文学造诣、语言能力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等因素创造性地选择翻译方法从而进行创造性翻译。

二、译者创造性的制约

如果译者的创造性缺乏制约的话,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以及译者创造性的合理性将陷入纯粹相对主义的恶性循环。翻译就其本质来讲与其说是一种阅读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受到制约的活动。译者的任务首先是重构作者的世界,进入作者的思想境界。译者不是原文作者,他充当的角色是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译文读者达到原文作者思想的彼岸。译者应以原文文本为准绳,发掘出其深层的含义。译者通过阅读和对原作的整个世界进行重构,把握住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内容,了解作者的意图、态度以及作品人物的感情等。这是译者创造性发挥的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译文的统一性。关于文本对阅读行为的制约作用，Naumann 提出了“接受指令”（the givens for reception）这一概念。接受指令指的是在阅读行为前文本本身存在的各种要素。“接受指令”这一命题表明了文本不但生产出满足读者接受要求的物质材料，而且还生产出文本接受的方式以及读者的接受能力。文本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结构和图式预先设定了读者接受的方向、读者的反应以及读者可能对文本的评价^[5]。而 Iser 则用“图式”（schemata）、“文本范式”（textual pattern）以及“文本的整体系统”（overall system of the text）等概念来阐释文本对读者理解的制约作用。Iser 在阐释文本对读者的阅读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制约作用时提出了“空白具体化”和“文本的整体系统”这两个概念。阅读过程即读者对文本的“空白具体化”的过程，当文本的各个图式结构相互关联时，空白即消失，读者完成阅读活动^{[4]183}。通过“空白的具体化”，即填补文本的空白，读者重新建构文本的“整体系统”，形成自己的理解，完成审美历程，获得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实际上，读者要填补的空白即“隐含性的东西”（something invisible）存在于文本的“整体系统”之中。“整体系统”是由文本的各个图式组成的结构。“整体系统”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指南从而为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总的框架。因此，我们认为译者在阅读活动中创造性地理解和阐释文学文本时，原文作者并未消失，他的写作轨迹仍然是作品理解的重要框架，文本的“整体系统”或图式结构对译者理解和阐释文本的创造性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世界上任何工作都离不开规范或标准，翻译活动同样离不开翻译规范。翻译规范是评论译作的根据，衡量译作优劣的准则。翻译规范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翻译实践证明，翻译不仅有翻译规范，而且有不同的翻译规范；翻译不仅有翻译规范的指导和约束，而且在不同的翻译规范的指导下，有了不同的翻译实践，出现了风格殊异的译文。文学翻译固然是一种艺术，有着“再创造”的性质，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在发挥其能动创造性的同时，仍然摆脱不了翻译规范的指导和制约。

译文读者的反应是形成翻译规范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对译者的创造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译文读者的制约作用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看法以及译文读者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译者对译文读者反应的估计。一般说来译文读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读者，另一类为非专业读者。专业读者指的是诸如翻译家、翻译评论家、文学评论家、编辑人员以及出版商等类型的读者，他们对译文的评论和看法极大地影响了译者的翻译活动，因为很少有哪个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将专业读者对译文的评论和看法加以考虑。译者与专业读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专业读者对译者生产出的译文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抽象的翻译原则或翻译规范。另一方面翻译原则或翻译规范又对译者进一步的翻译活动进行指导和制约，把译者的创造性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普通读者对译文的期待也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积极的反馈将极大地影响翻译规范从而制约译者的创造性发挥。许钧曾对中国读者对名著《红与黑》的译文的期待作过调查。调查结果是中國读者希望能够读到能反映异国情调和异域文化的翻译文学。给出两种原作的译文，一种是略带一点“欧味”的译文，另一种是过分归化的译文。要读者在这两种译文中做出选择，结果是大部分读者选择前者，其理由是他们希望能欣赏到外国文学特有的韵味，领略到外国文学作品所蕴涵的异国情调以及鲜明的语言风格^[6]。译文所针对的读者几乎从来就是决定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实际情况是，对译文读者的反应进行有效的评估常常是不可能的。一些优秀的译者，常常设想一位典型的译文读者就坐在写字台的对面听他们口述译文，或者正在阅读电脑显示屏上的译文。因此，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其能动创造性的同时,也必须将专业读者对译文的评论和看法以及普通读者对译文的期待和反应加以考虑。由此看出,读者的反应对译者的创造性发挥在一定范围内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三、结 语

通过以上对译者的创造性及其限度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文本不应只有一种理解和阐释,正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解构了作者或文本的绝对权威,使文学作品获得了再生。同时,作者的创造性翻译活动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译者创造性并非译者对原文有意识的背叛,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人变奏”。

参考文献

- [1] Wilss W.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145.
- [2]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53-69.
- [3] Fish S E.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 [C] // Tompkins J P.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Structural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74-75.
- [4]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5] 范大灿. 作品、文学史与读者[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17-20.
- [6] 许钧. 《红与黑》翻译的理论与实践[C] // 耿龙明. 翻译论丛.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189-192.

On Translator's Creativeness and Restric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ANG Dalai

(City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ption theory, the potential of meaning can be realized into various understanding by individual readers. As the translator is the reader of the source text, his active involvement i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text is significant. This paper, taking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meaning” related in the reception theory, aim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ness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some factors which restrict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ness. The discussion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ness is not his conscious “treason” of the source text, but individual variations within certain boundary.

Key words: Reception theory; Textual meaning; Creativeness; Restricting factors

(编辑: 周斌)